

近代日本政府对伪蒙疆政权 留日学生政策探微^{*}

徐志民

内容提要 近代以来,日本为控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内蒙古地区,极力吸引蒙人留日,以培养蒙古族人的亲日意识和亲日分子,扶植在蒙疆地区的代理人。1937年,日本出兵扶持德王建立了伪蒙疆政权,通过伪政权选派一批批的青年学生和喇嘛赴日留学,借机施以各种亲日、崇日教育,并把“学成”归国的留日学生安排到侵略者需要的各种岗位上,为其侵略战争政策服务。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其对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的政策也终归失败。

关键词 日蒙亲善 伪蒙疆政权 留日学生 留学政策

在研究中国留日学生的累累硕果中,有关内蒙古留日学生的研究却相对薄弱,虽在一些论著的章节中有所涉及,但所占份量相当有限。如著作主要有,卢明辉的《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版)、王奇生的《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沈殿成主编的《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齐红深主编的《日本侵华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余子侠和宋恩荣合著的《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二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等,都零星地提到了内蒙古留日学生问题。代表性论文有,娜仁高娃的

* 本文曾获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资助,特此致谢。

《试述蒙古族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毓正女学堂》(《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祁建民的《蒙疆政权的教育政策论述》(《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研究》,日本东京国立教育研究所1998年刊)、金海的《1931—1945年间的日本与蒙古喇嘛教》(《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横田素子的《明治时期的日本与内蒙古——以喀喇沁右旗扎萨克贡桑诺尔布为中心》(日本亚洲民族造形学会东京学术讨论会,2000年9月)、广川佐保的《40年代日本对内蒙古的政策与〈青旗〉报》(《蒙古学信息》2001年第4期)、居特固勒和阿云嘎的《贡桑诺尔布的改革图强及其与日本的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以及房建昌的《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与蒙古善邻协会西北研究所始末及其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等,大都涉及与之相关的个别留日学生。

截至目前,仅有娜仁高娃、田中刚、祁建民等学者分别从蒙古喇嘛留日学生、伪蒙疆政权的留学生事业、善邻协会与近代蒙古留日学生教育等角度对内蒙古留日学生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探讨^①,此外尚未见任何系统的成果问世。故笔者不揣浅陋,拟就近代日本对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的接受、教育、管理和毕业安置等政策,作些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① 娜仁高娃:《留学日本的蒙古知识分子——关于在智恩院学习的喇嘛们》,载乌云毕力格、娜仁高娃编《硕果——纪念扎奇斯钦教授80寿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日]田中刚:《“蒙疆政权”的留学生事业与蒙古留学生》,《历史研究》[日]38号,2001年3月;祁建民:《善邻协会与近代内蒙古留学生教育》,载李喜所主编《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伪蒙疆政权成立前吸引蒙人留日的活动

近代日本政府极为关注中国的内蒙古地区^①，不仅派遣大量特工人员搜集情报，而且极力拉拢各旗封建王公，吸引蒙古族青年学生和喇嘛赴日留学，借机灌输亲日、崇日思想，培养亲日分子，企图借机把内蒙古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

内蒙古地区位于中国北部边疆，北接俄罗斯，东端濒近日本海和朝鲜半岛，既是护卫中国内陆安全的天然屏障，也是日俄两国觊觎中国的战略要冲，在东北亚各国的战略竞争中地位十分重要。早在甲午战前，日本谍报员荒尾精就“对满洲、蒙古、新疆方面的动向也很关注”。^② 1903年12月，日本军部又利用河原操子担任内蒙古喀喇沁郡王府教育顾问和毓正女学堂总教习的机会，赋予其秘密使命。河原操子则“利用与喀喇沁旗王爷与福晋的私人交情，用巧妙的方式将王府变成了日本特务人员的联络据点。以亲属、同学等关系作掩护，接待前来执行任务的日本特工人员，为他们的衣食住行提供方便，甚至通过王府官员派旗民为之当向导”。^③ 为日本军方获取蒙古和俄国的情报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政府还极力拉拢各旗封建王公，邀请他们访问日本，派人协助思慕革新的蒙古王公贵族进行改革等，以期其在今后的对俄作战中站在自己的一侧。当日本政府获知内蒙古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有访日意向时，立即同意并邀请他访问日本。1903年冬，

① 蒙古本无内外之分，但依据归服清朝的先后顺序，通常被分为内、外蒙古，其所属地理范围大致类似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

② [日]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③ 娜仁高娃：《试述蒙古族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毓正女学堂》，《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第103页。

贡桑诺尔布由天津私搭邮船东渡日本,受到了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及其阁僚的热情接待,并由日本政府派员陪同,到东京、神户、京都等地考察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期间还参观了大阪第五次万国劝业博览会。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繁荣富强这一事实给其留下很深的印象,遂决定效法日本,发展教育,振兴旗务,改革图强。日本方面不失时机地表示愿意帮助。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向他推荐了女教师河原操子,帮助其创办了蒙古族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毓正女学堂。日本还同意贡桑诺尔布从旗军队中挑选数人送到北京东交民巷日本驻屯军的军营内,和日本兵一起学习器械体操和军乐。^①1903年底,日本陆军大尉伊藤柳太郎和陆军少尉吉原次郎,协助他在旗里开办了蒙古族第一所近代军事学校——守正武学堂。尽管日本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参与蒙古族的教育改革,但在客观上却开创了蒙古族近代教育的先河,培养了蒙古族近代第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在蒙古族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随着俄国对蒙疆地区侵蚀的加剧,而清政府却无力抗拒,深受其害的一部分开明蒙古王公也想以日本为榜样图谋革新,急欲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学习日本富强之法,甚至个别蒙古王公要求亲自赴日留学。如1905年蒙古土尔扈特王就申请出国留学^②,获得批准后,到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③1905年底,贡王乘河原操子回国之便,选派毓正女学堂的何惠珍、于保贞、金淑贞等3名女生与河原操子同船东渡日本,入东京实践女子学校学习。翌年冬,经日

① 吴恩和、邢复礼:《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6页。

② 董守义:《清代留学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3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第99号,第93页。

本政府的许可,又派遣伊德钦、诺门必立格、恩和布林、特睦格图、于恒山等五人赴东京入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后他们分别转入东京农科大学、千叶县医科大学、东京慈惠医科大学等学校学习。^①上述留日学生成为近代蒙古族人留学日本的先锋。

日俄战后,日本与俄国从1907至1916年间,先后4次签订协议,将内蒙古东部地区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以该地区为依托积极开展各种活动,与留日政策相关的有如下:

第一,暗中怂恿一些所谓的民间对蒙激进分子潜入内蒙古地区,四处拉拢和引诱蒙古族青年来日留学。如,大日本农村产业振兴会理事野尻喜辅、大本教信者目恒雄等人潜入内蒙古地区后,到处向蒙古族青年许诺“进日本任何学校,均准不考试入学”^②,并提供留日学费。1931年,目恒雄携带7名蒙古族学生赴日,请外务省从机密费中支付其留学学费。^③后由日本军方支持瓜生喜三郎创办的“经国学园”,接受了这批蒙古族留学生。

第二,支持善邻协会接受和教育蒙古族留日学生事业。1931年底,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决定进一步加强对蒙疆地区的文化工作力度。1933年,关东军参谋部指出,对于紧连热河的察哈尔蒙古各部的方针是“主要依靠和平的文化工作,特别是经济关系的密切使之自发导向亲满,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④后来军部也

① 居特固勒、阿云嘎:《贡桑诺尔布的改革图强及其与日本的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15页。

② 《日人引诱蒙人来东留学》,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1,目录号1,案卷号2391。

③ 《蒙古学生バインガア 外六名本邦留学(学资ハ机密费ヨリ支出) 目恒雄愿出》,《在本邦留学生关系杂件 第七卷》,资料番号:B-H-05-00-00-01-00-00-07,凡有资料番号的注释皆来自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下同。

④ [日]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8) 日中战争(一)》,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448页。

再三指示关东军：“对内蒙的政策依然要坚持以前的方针，不急于建立政权，在当前形势下，主要应以文化、经济工作为重点，这样也可达到目的。”^① 于是在1933年3月，井上璞、目恒雄等人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关东军及个别蒙古王公贵族支持和援助下，创办了日蒙协会，同年11月改称善邻协会。根据《财团法人善邻协会寄附行为》规定，其从事的主要活动包括对蒙古留学生的指导援助和经营培养比邻诸国人才为学校等。^② 故而其成员在内蒙古各地到处宣讲日蒙亲善，大谈成吉思汗及其伟业，使得学生对蒙古民族的兴盛历史感慨无量，幡然决定到日本留学。^③ 1934年4月，善邻协会“以培养将来满蒙文化的开发指导中坚分子和刚健有为的人才为目的，设置了善邻协会专门学校”^④，并在其内开设“蒙古学生部”，主要接受内蒙古留日学生。5月，就有10名参谋本部接受的内蒙古留学生入学，11月，又有德王保送的9名留学生入学。其后，迪拉瓦活佛、察哈尔盟盟长等也派遣留学生入学。^⑤

日本政府命驻内蒙古地区的领事馆为善邻协会接受内蒙古留日学生工作提供便利。1934年10月9日，日本驻赤峰的清野领事致电广田外务大臣，报告善邻协会会员古内五郎带领着招募的8名蒙古人留学生已于本月7日从当地出发，经朝鲜前往东京，受

① [日] 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8) 日中战争(一)》，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501页。

② 《善邻协会指导蒙古留学生渡日ノ件》，《善邻协会关系杂件 第一卷》资料番号：B-H-06-02-00-10-00-00-01。

③ 蒙古善邻协会：《昭和十六年度蒙古善邻协会事业成绩报告书》载《善邻协会·资料》，1941年版，第387页。

④ 《善邻协会专门学校ニ蒙古留学生特设予科设置ニ关スル件》，《善邻协会关系杂件 第一卷》，资料番号：B-H-06-02-00-10-00-00-01。

⑤ 《蒙古学生教育事业经费给与 金五六〇〇》，《善邻协会关系杂件 第三卷》，资料番号：B-H-06-02-00-10-00-00-03。

理事长井上璞的请求,本官已经发给针对沿途官宪的证明书、介绍信,并告知预定 12 日到达下关。翌日,即由外务省冈田文化事业部长致函山口县知事菊山嘉男《关于对留学生提供便利件》,命其给这批蒙古留学生提供旅途方便。1936 年 5 月 19 日,日本在赤峰代理领事栗本秀显致函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报告在 多伦的善邻协会会员林重弘带领 6 名蒙古学生已于 5 月 14 日从当地出发,入该协会所属学校,再次请政府给与关照。^①可见,日本驻内蒙古地区的领事馆、外务省和日本地方政府之间相互协作,时刻关注着善邻协会接受的每批蒙古族留日学生,并为其工作提供便利。

第三,利用所谓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积极接受有留日意向的蒙古族青年。1923 年 3 月,日本帝国议会通过《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和胶济铁路的部分收益,资助中国留日学生和两国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此基础上中日双方通过谈判,于 1924 年 2 月签订了《中日文化事业协定》,决定组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并由中方人士担任委员长。此后,日本政府却独掌文化事业的筹划、决策和管理大权,遭到中国教育文化界人士的反 对,特别是 1928 年济南事件后中方委员宣布退出该委员会。1929 年 12 月 26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废止前述协定,至此所谓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已经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法律基础,成为日本单方面的活动。然而,别具用心的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却打着东方文化事业的招牌,积极开展对华文化侵略活动,把关注蒙古族青年学生的思想动向和接受蒙古族留学生列为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1933 年 9 月 19 日,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致函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坪上贞二《关于蒙古青年希望

① 《善邻协会指导蒙古留学生渡日ノ件》,《善邻协会关系杂件 第一卷》,资料番号: B - H - 06 - 02 - 00 - 10 - 00 - 00 - 01。

留学日本的报告件》,报告了自日本侵占东三省后,蒙古青年学生“一方面极端厌恶近来汉人尤甚的压迫,另一方面提出强烈的自治要求,并希望获得日本的援助,以实现蒙古独立……他们在业余时间开始学习日语,希望将来到日本留学。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笔者注)以后,更加渴望实现到日本留学”。^①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乃挑选了13名蒙古族青年准备送往日本,并称赞“其感情之纯真究非汉人学生所能比,若获得日本的友好感情,其素质将获得充分发展”。^② 请文化事业部为其办理入学手续,并给与资助。此时所谓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不仅为日本政府提供关于蒙古族青年思想动向的情报,还直接为文化事业部接受蒙古族留学生服务。

第四,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馆以“近水楼台”之便利,直接参与接受蒙古族留日学生行动。1934年12月14日,日本在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菱刈隆致函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关于蒙古人留学生差遣案件》中声称:“选拔优秀的蒙古青年来日本留学,尤其学习与蒙古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畜产及兽医学,既有利于开发蒙古资源,弥补本国畜产资源不足的现实,还有助于日满蒙亲善。”^③并向日本政府提出每年接受5名蒙古族学生,并由文化事业部补给其旅费及学费的计划。1935年1月21日,广田大臣复函表示大体同意其计划。翌日,外务次官重光葵致函文部次官三边长治,转达了该项计划,请文部省准许5名蒙古族学生入学东北地方农学校。

① 《蒙古青年ノ日本留学希望ノ件》,《在本邦留学生关系杂件第九卷》,资料番号: B-H-05-00-00-01-00-00-09。

② 《蒙古青年ノ日本留学希望ノ件》,《在本邦留学生关系杂件第九卷》,资料番号: B-H-05-00-00-01-00-00-09。

③ 《蒙政部派遣留学生》,《满州国蒙政部派遣留学生关系杂件》,资料番号: B-H-05-05-00-07-00-00-00。

文部省及预备接受的各学校均表示同意,但要求提供有关这批蒙古族留学生的详细情况。此后,在日本驻伪满大使馆的指导下,由伪满政府蒙政部专门负责具体执行该计划,选派一批批的蒙古族青年赴日留学。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喇嘛教作为蒙古族共同信仰的宗教,在内蒙古地区的政治及民众生活中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日本政府十分注意拉拢喇嘛教上层人士,以日本佛教界的名义与有影响的呼图克图、格根等建立密切关系,并邀请他们访问、留学日本。1935年10月,首批15名蒙古喇嘛赴日留学。^①

日本政府不仅极力支持和协助对蒙古族留日学生的接受工作,还以大量资金补助其旅费、学费和教育经费等。1936年5月16日,善邻协会井上璞理事长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冈田兼一提出《对蒙古留学生教育事业给与申请书》,表示随着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多,所需经费也逐年增大,致使经费不足,故请求补助教育经费5600元。1936年11月28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通过《关于给与善邻协会的蒙古学生教育事业经费件高裁案》,认为教育蒙古学生在对华文化事业中极具重要意义,决定从昭和十二年度对华文化特别会计事业费中支付该项资金。^②1937年4月21日,井上理事长又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冈田兼一提出《蒙古学生养成费补给申请书》,再次以经费严重不足为由,请求补给本年度16名蒙古留学生学费11820元。5月5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通过《给与善邻协会培养蒙古留学生学费件高裁案》,批准了该项申请。5月7

① [日]春日行雄《日本与蒙古一百年》,《米子》,[日]亚细亚博物馆·蒙古馆1993年,第74页。

② 《蒙古学生教育事业经费给与 金五六〇〇》,《善邻协会关系杂件 第三卷》,资料番号:B-H-06-02-00-10-00-00-03。

日,冈田文化事业部长致函井上璞《对蒙古留学生学费给与件》,要求井上璞签署“指令书”,保证资金的正确使用,并接受外务省的监督检查。^①这样就间接地保证了外务省对接受和教育蒙古族留日学生工作的监督指导地位。

因此,在教育蒙古族留日学生的过程中自然也就体现着日本政府的意愿和根本利益。首先,最明显的就是教育蒙古族学生亲日、反华、仇苏。在教育蒙古族留日学生的“经国学园”内,拉拢蒙古族留日学生,组织蒙古留日学生会,并以其名义向北平、内蒙古等地的蒙古族人散发传单,出版《祖国》杂志,抨击民国政府的内蒙古政策。在传单中,宣扬成吉思汗称霸世界的丰功伟业,污蔑民国以来的五族协和实为压迫蒙古民族之举,反对苏俄开展的“赤化运动”,认为中国与苏俄是蒙古族最大的敌人,提出依靠强国日本的帮助,抗击中国的“同化政策”和苏联的吞并政策,发扬蒙古民族先人的伟业和固有文化,密切与日本共存共荣的利害关系等。在《祖国》杂志上,经常发表诸如《三民主义的对蒙古政策》、《蒙古问题的真相》等反华文章^②,在蒙古族学生中制造亲日反华仇苏气氛。

其次,鼓励蒙古族留日学生开展分裂独立活动。部分日本教员竟“忘记”了忽必烈曾两次发动征日战争,却欺骗说:“蒙古民族为忽必烈之后裔,而日人亦为忽必烈之后裔;日人当初因受汉人之压迫,故迁来日本,今既为世界强国,不忍使同种之蒙古人受汉族之虐待,势必援助蒙古,使能独立;蒙古人亦应有兴蒙灭汉之决心

① 《善邻协会养成ノ蒙古留学生ニ対スル补给金一一八二〇》,《善邻协会关系杂件第三卷》,资料番号: B- H- 06- 02- 00- 10- 00- 00- 03。

② 《蒙古人学生ヲ收容スル学园ニ关スル件》,《在本邦中国留学生关系杂件》,资料番号: I- 1- 2- 0- 004。

……至于金钱枪炮，日人当全数供给。”^①以援助蒙古独立的谎言来激发蒙古族人反对中国政府的信心和勇气。

最后，培养从事日蒙亲善的指导者和实践者。1937年6月，善邻协会在提交外务省的《昭和十一年度事业报告书》，宣称：“作为对蒙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选拔优秀的蒙古青年来我国留学，并给与学费，使其学习各方面的学问。由本协会经营的善邻学校接受，陶冶其品性，教育他们成为将来蒙古政治、军事、文化、产业等方面的指导者和蒙古民族更生、日蒙亲善的实践者。”^②为此，善邻协会不仅经常组织蒙古族留日学生实习、旅行，开展暑期训练、举办茶话会、在京蒙古留学生恳亲会等各种活动，酿造日蒙亲善的友好氛围；还为解决部分留日学生的学习成绩不良问题，于1936年4月7日向文部省提出在善邻协会专门学校内设置蒙古留学生特设预科的申请，并获得批准。^③这样，通过实施预科教育、斡旋升学、规范和指导日常生活等，不仅保证了蒙古族留日学生的学习质量，也借机灌输了亲日思想，塑造日蒙亲善的高级人才。

此外，日本政府还为毕业留学生的就职、归国提供帮助，以使这些留学生更好地为日本帝国的利益服务。1937年3月，何什格图、瑞永二人自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毕业，在善邻协会的斡旋下，何什格图进入满洲国哈尔滨师范学校，瑞永任职内蒙古军

① 《日人引诱蒙人来东留学》，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1，目录号1，案卷号2391。

② 《善邻协会养成ノ蒙古留学生ニ対スル补给金一一八二〇》，《善邻协会关系杂件第三卷》，资料番号：B-H-06-02-00-10-00-00-03。

③ 《善邻协会专门学学校ニ蒙古留学生特设予科设置ニ关スル件》，《善邻协会关系杂件第一卷》，资料番号：B-H-06-02-00-10-00-00-01。

政府。^①甚至个别时候,日本政府赤裸裸地协助军事留学生突破中国地方政府的监视和检查,返回内蒙古地区开展更直接的分裂活动。如,为使陆军士官学校蒙古族学生韩凤麟避开奉天政府的监视和阻拦,瓜生喜三郎亲自陪同其返回内蒙古地区^②,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日本在内蒙古地区开展的特务侦察活动,拉拢蒙古王公贵族的行动以及吸引蒙人留日之策就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内蒙古地区不仅是中国的北部边疆,而且自古以来就是抵御外族入侵的天然屏障,蒙古族还是满清王朝统治中国大陆的最重要盟友。清政府为巩固和加强在内蒙古地区的统治,防止蒙古族人因受日本笼络而出现离心倾向,决定主动派遣蒙古族学生出国留学。1907年,军机处拟定计划,准备选派蒙古族子弟送交学部、陆军两部考验后出国留学,“学习文事、武备,以为保固藩篱,免受外人笼络”。^③同时,赵尔巽、姚锡光、岑春煊等封疆大吏纷纷提出蒙古各部的改制问题、意见和方案。清政府也开始筹划在内蒙古设立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行省,只是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在内蒙古设省的计划未能实现。

民国成立后,日本政府引诱蒙古族人留日的活动愈演愈烈,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更是把侵略矛头直指内蒙古和华北。对此,1929年4月国民政府驻日使馆在给外交部的一个秘密报告中就曾写道:“近年以来,日本人常在黑龙江及内蒙古一带劝诱蒙人来东留学,表面以援助求学为名,里面颇有阴谋。及到东后,用种种

① 《善邻协会养成ノ蒙古留学生ニ対スル补给金一一八二〇》,《善协会关系杂件第三卷》,资料番号:B-H-06-02-00-10-00-00-03。

② 《蒙古人学生ヲ收容スル学园ニ关スル件》,《在本邦中国留学生关系杂件》,资料番号:I-1-2-0-004。

③ 《议选蒙藩子弟出洋留学》,《大公报》1907年8月26日。

方法养成其亲日排汉之思想。本使馆曾经嘱托留日黑龙江省学生曲祥、河北省学生王瑞基等暗中调查此事。兹据该生等报告称：生等近与内蒙同胞陶多三等谈及日人用各种欺骗手段引诱我蒙古同胞，以期宣传内蒙之独立。似此重大阴谋将来实足扰乱我国之治安。今若不急思制止，则后患何堪设想。”并断言“按此情形，其背后必有日政府后援”。^①该报告再次证明了日本企图用“文装的武备”来分割内蒙古地区的野心。

为对抗日本在内蒙古地区的侵略活动，国民政府决定在内蒙古设立行省，把各盟旗分割在省县之内。该措施虽然有利于统一政令，集中力量对付日寇的侵略，却使内蒙古人民长期聚居的共同区域四分五裂，封建王公的权利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反而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札萨克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为抵制国民党政府在内蒙古设省，自1933年起发动了“民族自治”运动。但该运动遭到了国民党政权的压制和破坏，而这却为日本的“内蒙工作”提供了绝好机会，关东军立即表示支持，并愿意帮助德王建立“蒙古国”。1935年12月，德王前往伪满首都新京（即长春），与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参谋长西尾等人会见，达成了由日本先送给他50万日元和5000支步枪，帮助其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建立傀儡政权的协定。^②翌年2月，德王经过多方活动，组建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宣布脱离中央政府，成为日后建立伪蒙疆政权的雏形。

① 《日人引诱蒙人来东留学》，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1，目录号1，案卷号2391。

② 《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载《内蒙古自治区文史资料》第13辑，第16页。

伪蒙疆政权的建立及日本对其留日学生政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之间进入全面战争时期。日军为防止日后“北进”时苏军由外蒙古南下包抄其后路,进而得到向外蒙古和苏联远东地区扩张的立足点,以及解除南侵中国内陆的后顾之忧,决定出兵占领内蒙古部分要地,扶持亲日满傀儡政权。1937年八九月份,日军相继攻陷了张家口、大同,分别扶植了伪察南自治政府和伪晋北自治政府。10月,日军在伪蒙军的协助下,接连攻占绥远、包头等地,于10月27日成立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1月22日,关东军从其侵华总体战略目的出发,指示察南、晋北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三个伪政权在张家口组建成统一的伪蒙疆联合委员会。为满足德王建立“蒙古国”的愿望,1939年9月1日又把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改组为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不管形式如何变换,都是由日本驻蒙军^①司令官、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部长和各种日本顾问控制伪蒙疆政府的实权。

虽然日本人在政治和军事上控制了蒙疆地区,但是他们深知:要把蒙疆地区真正地从中国分离出去,达到长期有效地控制蒙疆地区的目的,必须在文化上做到“日蒙亲善”,使蒙疆地区日本化。在伪蒙疆政权建立之前,一些日本人如河原操子、乌居君子、伊藤柳太郎、吉原次郎等都非常注重这一地区的日语教学,而善邻协会则直接开办了一些日语学校,开展日语教育。如厚和速成日语学院、包头日本语讲座等。在伪蒙疆政权建立后,日本侵略者特别强调普及日语教育的重要性,把日语作为各民族学生都必须学习的

① 日本驻蒙军:即原关东军侵占内蒙古时的察哈尔兵团,后改编为驻蒙兵团,1938年改编为日本驻蒙军后,受日本华北方面军节制。

共同语言,以“养成亲日的气氛,通过语言理解日本,培育对日本的信赖观念”。^①但是日本认为,在战争期间“要根本铲除由过去的欺骗、容共政策而培养起来的排外抗日思想”^②,就地培养日蒙亲善人才,普及日语教育,周期长,见效也慢。

日本为了更好地培养蒙人亲日分子和傀儡政权的上层统治人才、更快地培育出奴化教育师资和宣传“大东亚圣战”人员、利用日本的特工技术训练蒙人特务,便于对外蒙古及苏联进行间谍活动等,直接插手伪蒙疆政权的教育,选派合乎其意者赴日留学。关东军在关于内蒙古西部的教育施策要纲中规定:“对于蒙民的教育当前止于小学教育,且以职业教育为重点……除了对特别优秀的所需人员外不随意实施高等教育。”^③在日军授意下成立的厚和蒙古研究会制定的蒙古族教育方针中也称:“鉴于蒙古的实情,将初等教育、体育和实用技能教育作为重点。”^④所以,在伪蒙疆政权的教育体制中只设初等、中等教育,没有高等教育,要接受高等教育只能到日本留学。同时,为了让蒙古喇嘛“修日本佛教之精髓”^⑤,根据日本驻蒙军的安排,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从1938年开始派遣青年喇嘛到日本寺院学习。^⑥1939年11月,晋北大同“日华佛教会”也选派24名“优秀生”前往日本学习佛法。^⑦1940年8

① 蒙古善邻协会:《昭和十六年度蒙古善邻协会事业成绩报告书》,载《善邻协会·资料》,1941年版,第387页。

② 察南政厅:《察南自治政府史》,1941年版,第16页。

③ [日]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8) 日中战争(一)》,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494-495页。

④ 厚和蒙古研究会:《兴蒙推进纲要》,1941年版,第190页。

⑤ 《蒙古喇嘛九名赴日留学》,《盛京时报》1942年10月9日。

⑥ 金海:《1931-1945年间的日本与蒙古喇嘛教》,《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⑦ 《晋北大同日华佛教会优秀生赴日》,《新民报》1939年11月18日。

月19日,在关东军授意下,伪满洲国政府颁布的《喇嘛教整备要纲》规定:把留学西藏改为留学日本。^①该文件虽由伪满政府颁布,却是针对整个喇嘛教的,因此,主要适用于蒙疆地区。

除了硬性政策规定外,日本也继承了伪蒙疆政权建立前的吸引蒙人留日政策,以补给学费,斡旋入学相引诱。1938年1月22日,日本驻海拉尔代理领事三村哲雄向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报告:因外务省补助蒙古族留日学生学费,得到了留日学生“所属旗公署对我方有极大的好意,即使其所属省的省长也多次言谢,预想这些留学生毕业回国后在我方的对蒙政策上大有益处”。^②并提出《蒙古留日学生学费补给稟请件》,希望外务省为新巴尔虎旗参事官推荐的乌勒聚木尔图、祚玛加普提供留学学费。2月1日,广田大臣复函三村哲雄,同意由文化事业部为其斡旋入学和补给学费。1939年10月21日,日本文化事业部长三谷隆信致函善邻协会常务理事大岛丰《关于选拔留学生选定件》,通知因受驻张家口望月代理总领事的推荐,选定了入学善邻高等商业学校的王豫复等5名留学生为选拔留学生,由文化事业部为其提供学费补助。1940年5月2日,三谷通知善邻协会会长一条实孝,将继续补给前述5名留日学生学费。^③尽管此处所举仅是对众多蒙古族留日学生进行学费补助的个例,却也表明了日本政府继续通过个人、善邻协会、驻蒙疆地区领事馆等机构吸引和接受蒙古族留日学生的事实。

日本政府还采取了各种宣传鼓动措施,鼓励和刺激内蒙古各界人士的留日愿望。1943年,驻蒙日军选取了8名回民女塾学生

① 《喇嘛教整备要纲》,《盛京时报》1940年8月21日。

② 《留学生学资补给》,《善邻协会杂件 第二卷》,资料番号: B- H- 06- 02- 00- 10- 00- 00- 02。

③ 《留学生学资补给》,《善邻协会杂件 第二卷》,资料番号: B- H- 06- 02- 00- 10- 00- 00- 02。

组成蒙疆回教女子访日视察团前往日本参观访问。该团于10月5日抵达东京,参观了各种学校、广播电台、天文台、钟渊纺织工厂、明治神宫及土浦航空队等机构,并在首相官邸受到了东条英机夫人的热情招待。回国后,该团相继在张家口、大同、厚和及包头等地举行了大型报告会,宣讲日本的文明与教育的进步,激起了一些人的留日愿望。如该团成员麻觉慧于1944年3月通过留学生考试,进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日本军方还拨出大批经费,邀请有名望的上层喇嘛访问日本佛教各宗总本山,据幽经回忆,他本人于1942年和1943年曾两次组织内蒙古西部地区有影响的十几名上层喇嘛访问日本各地寺院,并受到陆军省的周密接待^①,以宣传日本佛教文化的先进性,吸引蒙古喇嘛留学日本。

此外,一些伪职人员为讨好日本主子,主动遣派子弟赴日留学。如,曾任伪蒙疆政权参议府议长、政务院院长的吴鹤龄就把其弟吴鹏龄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伪蒙古军参谋长乌古廷也把他弟弟岸门布和派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等。另外,也有一些家境殷实的有志青年在日伪统治区的严密监视下,既不可能去其他国家留学也无法到国统区升学进修,要留学只能忍辱负重去日本。由此,在伪蒙疆政权后期,自费留学生逐渐增加。^②依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笔者尚无法统计出伪蒙疆政府派遣留日学生的确切人数,但据初步统计,三四十年代在日本各寺院学习的蒙古喇嘛有一百多人。^③到1942年11月,在日蒙古留学生有163名。^④仅

① [日]幽经虎:《日本的秘密战与蒙古喇嘛工作》,《资料与情报》1981年第1期。

② 齐红深主编:《日本侵华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页。

③ 娜仁高娃:《留学日本的蒙古知识分子——关于在智恩院学习的喇嘛们》,载乌云毕力格、娜仁高娃编《硕果——纪念扎奇斯钦教授80寿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426页。

④ 齐红深主编:《日本侵华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页。

张家口市留日预备学校在1941、1943、1944年共向日本派遣蒙古族学生58名。^①再加上其他学校派遣和以不同途径赴日的留学生,伪蒙疆政权在不足8年的时间内,派出的留日学生和喇嘛至少也有400名,这不能不归因于日本在该地区所做的前述工作和推行的留学政策。

日本侵略者为使蒙疆地区的留日教育制度化、长期化,唆使蒙奸吴鹤龄等人组织成立“蒙古留学生后援会”,并于1941年在张家口市建立留日预备学校。1940年10月10日,吴鹤龄在蒙古留学生后援会成立大会的报告中称:“为了实现蒙古民族的复兴,今后计划依靠大日本帝国的援助,培养人才,促进文化。为实现此目的,痛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年少气锐的学生委托大日本帝国的学校,与大日本帝国的国民施以相同的教育……其前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在成立之初就排出万难,派遣了近三十名官费生和十几名自费生,倾全力培养青年体会日本精神、理解日本文化。”并表示:“日本政府极为赞同该计划,并给与了特别的援助和同情。”^②不仅透露了日本政府命傀儡政权派遣留日学生的真正目的,而且表明了后援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伪政权选派留日学生,配合日本政府对蒙疆地区的文化工作和军事战争政策。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甚至直接参与组建张家口留日预备学校——“蒙疆高等学院”,该校的主要经费也是由蒙疆联络部和伪蒙疆政府共同拨出,蒙疆联络部每人每月100日元,伪蒙疆政府兴蒙委员会每人每月95日元。以蒙奸吴鹤龄为首的“后援会”,通过向王公贵族和军官集资,每人每月90日元,共同支援留日预备学校。为保证教育“质

① 沈殿成主编:《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93页。

② 《蒙古留学生后援会发会式举行》,《参考资料关系杂件 第三卷》,资料番号: B- H - 07- 02- 00- 04- 03- 03。

量”，蒙古学生必须在留日预备学校学习 2 年，成绩合格后才被批准赴日留学。^①当然，为了鼓励蒙人多派留日学生，象蒙民裕生会资送的蒙古族学生到日留学、喇嘛教徒赴日留学以及自费留日生则不在此列。日本政府通过伪政权建立留日预备学校，成立蒙古留学生后援会，不仅保证了蒙古族留日学生的“质量”，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充足生源。

日本为使每位伪蒙疆政权的留日学生回国后，能够在服务日本侵略方面发挥最大成效，故而在选拔留日学生时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选拔具有亲日精神和健康体魄者，即愿意且能够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者。尤其是蒙古留学生后援会成立后，“留学生的选拔采用政府与后援会合作的考试制度，第一原则就是精神和健康”。^②其次是出身，即留日学生多为内蒙古的“豪门望族”子弟。除了吴鹤龄的弟弟吴鹏龄、乌古廷的弟弟岸门布和等人外，还有仓都固令、乌云额德尼、鄂嫩日图等也都出生于内蒙古的名门望族。日本侵略者甚至直接指示蒙民裕生会资助翁牛特旗右旗王爷的继承人——14 岁的鲍洪举赴日留学，以待在日本培养几年后回来接替祖业，成为亲日势力。再次是民族，即选派留日学生倾向于多派蒙古族学生。例如在 1942 年共选派赴日留学生 158 名，其中蒙古族学生 116 名，汉族学生 36 名，回族学生 6 名^③，蒙古族学生占了七成还多。可见，日本重点在蒙古族青年中培养亲日分子，希望以后能通过他们来完成分离、统治蒙疆的目标。第四是宗教，由于日本侵略者早已认识到喇嘛教在蒙古地区政治生活中的巨大

① 额力敦络：《赴日学习前后片断记》，载《苏尼特右旗文史资料》，1987 年印，第 78—79 页。

② 蒙疆新闻社：《蒙疆年鉴》，1941 年版，第 237 页。

③ 齐红深主编：《日本侵华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25 页。

影响,故特别注重选派内蒙古的喇嘛教徒留学日本,力图通过培养青年喇嘛来控制蒙古族,并通过这些喇嘛伺机向伊克昭盟、阿拉善旗、额济纳旗、青海、新疆等未被日本占领的地区扩张其势力。又因为喇嘛教是内外蒙古共同信仰的宗教,所以通过培训这些青年喇嘛特工便于在外蒙古和苏联开展特务活动。如前所述,在日本的安排下,伪蒙疆政权不仅向日本派遣了为数众多的喇嘛留日生,还把传统的喇嘛留学西藏改为留学日本。作为主要接受内蒙古喇嘛留学生的京都智恩院亲自派人前往蒙疆地区招选大批喇嘛,以至于伪政权因于喇嘛人数不够,不得不以俗家人充数。^①最后是资质和学习成绩。如在张北师范学校,每年实行日语统考,日语成绩突出者不仅给予物资奖励,而且还选送日本留学。1943年11月,张家口回教初级第一小学校的丁瑞兰与王淑贞因日语比较优秀而被奖励赴日本留学。

日本方面极为重视对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留日学生施以各种必要的教育。蒙古族留学生赴日后“首入东京淀桥大久保之善邻高商接受入学基础教育,其后方入其他各大学、高专而学皇道教育”。^②其中,普通留日学生与日本学生一样,学习修身、国文(日文)、数学、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生物、英语等,每天上6节课,每节课40分钟,每学期还要进行期中、期末考试。喇嘛留学生则每天早晨4点半起床,首先奉唱日本历代天皇的尊号,然后再诵读佛经,俨然把天皇凌驾于佛祖之上。他们学习的课程主要有日语、修身、佛教史、亚洲史、亚洲地理、日本史、欧洲史、数学、物理、佛教常

① 齐红深主编:《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2页。

② 《留日蒙古学生激增善邻高商开恩亲会》,《盛京时报》1942年11月13日。

识及军事训练课等。^① 从其所学课程来看,注重文化基础知识教育和日语教育,耐人寻味的是在喇嘛留学生教育中还有军事训练课。在课堂教育之外也搞一些文体活动,尤其是利用假期时间组织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赴日本各地参观学习,亦称“夏期训练”,主要活动就是参拜神社、遥拜皇宫,并借机宣讲“大东亚圣战”和“武士道精神”等,以使它们能领略大日本帝国的文化精髓。留日喇嘛要经常听日本佛僧讲述:“佛教广大无边与日本精神无别,日本皇室的尊严、忠孝合一,日本的历史在世界上无比”,以及“从宗教角度看日满蒙的亲善”等^②,实为另一种方式的亲日、崇日教育。

日本在教育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时,按照“工业日本,农牧业蒙疆”的政策,严格地限制他们选择专业和学校。早在1935年1月16日,日本外务省认可的《蒙古人留学生日本派遣案》中,就规定教育蒙古族留日学生的宗旨是“为培养蒙古人主要产业——畜牧业相关的专业技术员,选派蒙古人学生在日本专门中等学校留学,以资蒙古产业的发展”。^③ 并按照该派遣案的计划,把蒙古族留日学生分派到宫城县立宫城农学校、青森县立三本木农学校、北海道厅立空知农学校、北海道厅立十胜农学校等学校,学习畜产兽医学。对此,部分蒙古族留日学生在给亲友的通信中不满地说:“善邻协会对留学生的研究科目加以限制,奖励农工业等实业方面

① 娜仁高娃:《留学日本的蒙古知识分子——关于在智恩院学习的喇嘛们》,载乌云毕力格、娜仁高娃编《硕果——纪念扎奇斯钦教授80寿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437页。

② 齐红深主编:《日本侵华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页。

③ 《蒙政部派遣留学生经费关系 昭和十年一月》,《满州国蒙政部派遣留学生关系杂件》,资料番号:B-H-05-05-00-07-00-00-00。

的研究,禁止研究政治或社会问题,就是日常生活也有很多限制。”^①因此他们逐渐对日本留学教育的目的产生了怀疑。伪蒙疆政权成立后,更加严格地限制留日学生的专业和学校。据时任兴蒙委员会教育处处长的陶布新回忆:“选派留学生时,仍是限学农业、师范、兽医、军事、医学、政经等科,学习工业者记得仅有陈松涛一人。”^②而且他们大多被集中在千叶医科大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带广兽医专门学校、北海道大学等几所学校。日本政府此举的目的是要把大多数蒙古族留日学生培养成农牧业技术人员,变蒙疆地区为其侵略战争的又一个物质基地。

此外,日本政府还支持成立留日蒙古学生修养会,要求留学生遵守管理规定,致力日蒙亲善^③,以便于管理和控制。值得注意的是,特意加强对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的蒙古史教育,煽动蒙古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挑拨蒙古族留日学生与其他中国留日学生之间的关系,制造蒙汉学生之间的仇恨与不和,企图坐收“渔人”之利。

日本把这些经过奴化教育和训练的留日学生主要安置在伪蒙疆政府各级机关、军队、团体工作,也有一些人从事日语教学工作,还有一些人成为谍报人员,以及从事“反共”、“圣战”等工作的宣传人员。豪门望族出身的留日学生回国后多数出任伪蒙疆政府的各级官吏,尤其是德王推荐的蒙古族留日学生回国后,多数出任军职或担任中央官职。如暴德章(蒙名哈丹巴图尔)任德王亲卫队队长、毕格勒图和那木四郎皆任蒙古军司令部副官、陈国藩(蒙名超克巴达尔夫)任联盟政府秘书和主席府总务处长、乌鹏(蒙名超克

① 《留日蒙古学生ノ通信ニ关スル件》,《参考资料关系杂件 第六卷》,资料番号: B-H-07-02-00-04-01-06。

② 陶布新:《伪蒙疆教育的忆述》,载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7辑,第174页。

③ 善邻协会调查部:《善邻协会调查月报》第六十五号,1937年10月。

图奔赖)任主席府秘书官等。^①而资质聪慧、日语很好的丁瑞兰、王淑贞等人返乡后则从事日语教学工作;麻觉慧于1944年8月作为留日学生代表被派回国,与40位教育界人士进行座谈,介绍了“决战”背景下日本教育的状况和学生的“斗志”。从日本各寺院毕业的伪蒙疆喇嘛留日生少数回到各自的寺庙当喇嘛,大多数被分配到当时急需日文日语人才的各机关、团体和学校,从事翻译、秘书或日语教学工作。^②也有一些喇嘛留学生被派到特务机关工作^③,对外蒙古和苏联开展间谍活动等。

日本通过宣传鼓动、出资经费、行政命令等多种方式,让伪蒙疆政权选派了一批批的青年学生和喇嘛赴日留学,借机施以各种教育,以宣传日蒙亲善和培养蒙人亲日分子,并把“学成”归国的留日学生安排到侵略者需要的各种岗位上,从而更好地维护其在蒙疆地区的殖民统治,为其侵略战争政策服务。但是,随着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其对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的政策也归于失败,绝大多数留日学生重新投入祖国的怀抱,为国家的兴盛、民族的发展贡献力量。

结 语

虽然日本对伪蒙疆政权与伪满洲国、汪伪政权留日学生的政

① [日]田中刚:《“蒙疆政权”的留学生事业与蒙古留学生》,《历史研究》38号,2001年3月。

② 娜仁高娃:《留学日本的蒙古知识分子——关于在智恩院学习的喇嘛们》,载乌云毕力格、娜仁高娃编《硕果——纪念扎奇斯钦教授80寿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449-451页。

③ 扎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二)》,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3年版,第431、450页。

策,在培养亲日分子和傀儡组织上层统治人才,训练内奸、特务和宣传人员,开展奴化亲日教育,酿造日、“满”、华、“蒙”亲善氛围上具有相同之处,但日本对伪蒙疆政权与对其他傀儡政权的留日学生政策相比还有两个鲜明的不同点。其一,侧重蒙古族人的留日教育。从留学生选拔到教育内容,都是侧重选拔蒙古族学生,施加蒙古史教育,煽动民族分裂情绪,制造蒙汉不和与仇恨。其二,注重内蒙古喇嘛教徒留日教育。从邀请喇嘛教上层人士访日到1940年制定的《喇嘛教整备要纲》规定喇嘛留学日本,从留日期间的宗教教育到回国后的安置都有一整套的措施和规定。虽然日本在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也重视回教及其他宗教学生的留日教育,但对伪蒙疆政权的喇嘛留日教育较为重视。从中可见,其根本目的就是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通过“培养”的蒙古族留日学生,制造日“蒙”亲善气氛,把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受日本控制,从而有效地配合日军“北上”或“南进”的侵略战争政策。

(作者徐志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

(责任编辑:李仲明)